



也斯

孤寂的迷宮

墨西哥，一個拉丁美洲國家，對我們來說，好像是很遙遠的地方。一本談墨西哥生活和思想的書，對我們來說，有什麼意義呢？大概我們都免不了要這樣問。奧大維奧·帕斯（Octavio Paz）的「孤寂的迷宮」（*El Laberinto de la Soledad*，一九五〇年墨西哥 Cuadernos Americanos 出版，英譯 *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一九六一年美 Grove Press 出版）是一本談墨西哥生活和思想的書，但它更是一本好的散文，也有啟發性的思想，而最重要的，它代表了一種對本國文化自覺反省的態度。帕斯說，每個人生下來是孤獨的；兒童和成人，藉着遊戲和工作超越孤獨，只有青年，擺盪在兩者之間，在世界豐富的寶藏前停下來，開始反省自己，對自己的存在思索。他的孤獨，變成一個問題。而一個國家也是這樣，發展到某一個階段，人們就會停下來自問：我們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民族，我們到底該怎樣做？藉着這些自省，才可以更肯定地重新行動，藉着對自我的更深的認識，才可以打開圍牆與世界溝通。

在自省的過程中，提出問題，然後就找尋一些答案。正如帕斯說：這些答案，或者會隨時代和地方而

改變：那種反省的態度才是最重要的。這裏想介紹的，也是那種態度。而且，拉丁美洲國家和東方國家有許多基本相似之處，在它們的問題中，我們一定也可以看到我們的問題。

擺盪者

帕斯談文化的差異時提到一種帕諸高人。所謂帕諸高人是指一些移民到美國的墨西哥年青人，他們離開了本土，不再說自己的言語，跟自己國家的文化隔絕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能適應美國這新環境的文化。所以他們奇裝異服，行為怪誕，成了問題青年。

帕諸高人故意穿上奇裝異服，惹事生非，他們不適應移居的社會，但却不是躲起來，而是故意惹人注目。他們公開冒犯一切規則，彷彿只有懲罰才可以瓦解孤寂，受罰的時候，他們才重新成為他們否認的社會的一份子。帕斯認為帕諸高人的問題是他們擺盪於墨西哥和美國這兩種不同的文化之間。帕諸高人的態度是一種擺盪的態度。（香港或海外的中國人，不也是同樣處於兩種不同的文化中的擺盪者，同樣是感到

難以適應嗎？儘管有不同的根源、不同的表現。）

墨西哥和美國之間（或者說，拉丁美洲和北美之間），有什麼大差異呢？帕斯說：到處人們都是孤獨的，但一個活在高原上堅冷如石的夜空下的墨西哥人和一個活在抽象的機械世界的美國人是不一样的。墨西哥人活在自然力量之間，但他失去了跟那些力量聯繫的能力，所以他沉默了：這種孤寂是一種宗教式的感情，一種孤兒式的感情，因為萬物失去了連繫而孤寂。但美國人是活在他所創造出來的機器之間，他因為不能再在那些非人化的機器間認出自己，或者因為他的創造品不再服從他而覺得孤立。

這是兩個對立的世界，如我們要歸納，可以說是原始的、感性的世界與物質文明的、服從規條的世界對立。一個社會越發達，這種對立越是顯著，不能適應的人，就擺盪在這兩者之間。帕斯這本書寫於一九五〇年，那時恐怕還未有嬉痞吧。十多二十年後，帕諸高青年怪誕的衣飾却成了全球性的風氣。近年反叛的年青年人，把原始的、感性的世界當成理想國。比如說，那些嬉痞，他們不正是崇尚原始式的生活、贊同回到自然，不正是反對人為規律，拋棄這機器的世界

麼？最明顯也最表面化的是：墨西哥的衣着和印第安人的裝飾不是在這些青年人之間流行起來嗎？

當年帕諸高青年離開墨西哥到美國去而不能適應，近年美國及其他地方青年是相反地要擺脫美國或其他文明世界的背景投身於墨西哥式的原始世界，但他們的不能適應是一樣的。因為移民，因為交互的影響，到了今天，這不僅是兩個國家兩種文化的不同，這種衝突根本就存在於每個社會中了，一方面是機械文明的發展，一方面是針對這種生活的反叛。機械文明的手指觸過活生生的人把他們也變成僵硬的金人，有人就覺得需要清冽的河水的洗禮把他們還原了。所以有了嬉痞及其他青年的脫離文明，回到原始，他們也是穿上墨西哥人般的奇怪衣飾。一個個胡士托音樂節式的聚會，正是帕斯筆下的墨西哥狂歡節日。帕斯的話成為應驗了的預言。但這種放縱的狂歡也是另一極端。帕斯也看到這點，他說：奇怪的是到了今天「生活的意思竟然等於放縱了。人們擺盪於兩者之間，這兩種生活態度：呆滯與放任，同是兩個極端，同樣顯示彼此不能追隨生命真正的節拍。」

生與死

說到放縱與狂歡，自然叫我們想到墨西哥的嘉年華會、狂歡佳節。我們在電影中不是經常看到他們的狂態，在報章的報導上不是讀過他們的狂歡儼如巨災，百多人在狂歡中喪生的新聞？

墨西哥這類國家是充滿各式節日的。他們每個鄉村每個城市都有守護神，自然也有向神致敬的節日。一個小村每年的總收入可能只有三千披索，但却大部份花耗在節日上。帕斯說：「我們的日曆中是擠滿節日的。在某些日子裏，整個國家，從最遙遠的村落到最大的城市，人們一起祈禱、喊叫、歡宴、酗酒和毆殺，一切都是為了紀念加達立比，或者賓尼都·祖亞里斯的聖處女。在十二月十五日晚上十一時，我們在全國各處的廣場上慶祝基督節（按：即一八一〇年反抗西班牙的紀念節日），興奮的羣衆們真是整個鐘頭呼喊過不停……也許是為了在一年其餘的時間中好保持沉默吧。」

在狂歡節日裏，酗酒、毆鬧，甚至殺人。一個狂

歡節日居然死掉百多人，這種輕率的死亡，叫人詫異。帕斯在「孤寂的迷宮」中，剛好也同是由節日說到死亡。阿茲特克人（即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的宗教認為人的生死是整個宇宙連綿不絕進化的一環，人的死亡滋長了萬物的生長；基督教則認為死亡是一種轉化，由塵世暫時性的生命進入永生的過程。這兩種對死亡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彼此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認為死亡可以帶來一種新的生命。但現代人看死亡却往往沒有這種超越的意義，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價值。帕斯說得很精采：「相反的，墨西哥以熟悉死亡，跟它開玩笑，愛撫它、慶祝它；死亡是他最喜歡的玩具也是他最忠貞的愛……」

「我們用骷髏頭裝飾自己的屋子，我們在紀念死者的日子吃骨頭形狀的麵包，我們喜歡的歌曲和故事裏有死亡的笑話，但所有這些炫誇的稔熟並不能使我們噤聲不問：死亡是什麼？我們想不出一個新的答案。每次我們問的時候，我們聳聳肩膀：我根本還未關心過生命，我為什麼要管他什麼死亡呢？」

生命與死亡是分不開的，如果對死亡漠不關心，對生命也是同樣漠不關心；如果覺得死亡沒有意義，

那麼生命也是同樣沒有意義了。

墨西哥人在節日的遊戲，在思想方面都表現了死亡，為什麼還說他們不敢面對死亡？大概因為這只是一種「炫誇的稔熟」，一種太熟悉所以忽略了的東西。

這樣說並沒有什麼抽象，只要看看我們活在那裡的社會便知道了。在香港，一切電影、電視、報章、雜誌無時不是誇大地呈現死亡的面貌：反覆地描寫着暴烈的、血淋淋的死亡。到頭來，一般人還不是變得對這種死亡無動於衷麼？

你看一部電影，你看見一個人拿一柄劍劈到另一個人臉上，鮮血直冒出來；你看一篇小說，你看見一個復仇者在另一個人身上連刺十來刀；你打開報紙的新聞版，你看到一個人怎樣謀殺一個人然後把他分屍用膠袋盛開……

死亡是如此普通，如此輕易。在街上瞪人一眼便被人刺幾刀。難怪許多人都是覺得，不但是生命沒有什麼意義，死亡也沒有什麼意義了。

帕斯曾經說過死亡反映生命。現代社會集中營式的集體死亡反映了沒有個人生存的集體生活。即使是

謀殺。兇手與死者也逐漸變得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是人與物的關係：把他肢解，用酸液毀滅屍體，簡言之就是把他當物體來處理。

里爾克杜英諾哀歌的第八首談及生物如何在原始純真的狀態中看見廣大世界。但現代人無疑離這種狀態越來越遠了。人再也不敢張望無窮的絕對。因為恐懼，他不敢面對死亡；所以他也不敢面對生命。因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

他們的生活又怎樣？帕斯便說節日的瘋狂顯示出人們的孤寂，使他們不能與這個世界溝通。平日的生活是一種孤寂的生活，節日無疑是一個忍耐許久以後的爆炸，但這些狂歌亂舞並不能帶來什麼溝通。友誼和愛情往往以狂亂結束，就像這些拉丁美洲國家的政治改革往往以暴力結束一樣。一個孤寂的墨西哥人，他忽然爆發了，撕破自己的心胸……就是這樣，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如果我們在節日中敞開自己，或者在喝醉了酒或跟朋友推心置腹的時候，我們做這麼激烈，以致傷害自己了。而我們向死亡聳聳肩，就像向生命，以沉默或者一個鄙視的微笑跟它對質。這狂歡節日，這熱

情的罪和沒有回報的罪顯示出我們那麼引以為傲的安穩不過是一個面具，隨時會被我們突然爆發的「親暱」態度撕破。」

在那面具背後的是什麼？便是那永遠存在的孤寂了。

孤寂是永遠存在的，是與生俱來的。孩子藉着遊戲來超越這種孤寂，成人藉着工作來超越這種孤寂。但帕斯說，一個墨西哥人不能超越他的孤寂，只是把自己鎖在孤寂裏面。害怕面對這世界。在日常生活中心是孤獨沉默，即使狂歡的節日也不過是一個面具，在面具背後還是無邊的沉默。所以一個墨西哥人實在是擺盪於過份親暱與過份退縮之間，於高喊和沉默之間，於狂歡節日和守夜的日子之間，他們只有極端，在兩方面，他們不能面對生命也不能面對死亡。

墨西哥面具

帕斯說墨西哥人往往是戴上面具的人，每個墨西哥人都封閉以求保護自己，臉孔和微笑都不過是面具。因為他是孤寂的，所以他想盡方法來防衛自己，如

果他說話的時候，他的話中充滿影射和暗喻；他表達時吞吞吐吐；他沉默時，沉默中充滿寓意：甚至吵架的時候，他罵人也轉彎抹角。一個這樣的人，他是在自己和世界之間築起一扇牆。他跟其他人隔離開來。

一個人如何使用言語表達自己，顯示出一個人跟外界的關係。帕斯說一個墨西哥人以向別人傾訴真心話爲耻。那顯示他們不願開放自己。帕斯又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往往是充滿猜疑的，即使好朋友也好，也害怕推心置腹換來別人的嘲笑，害怕在情感上被人出賣。也因這樣，即使對「同情」或「溫柔」這些感情也是抱保留的態度。因爲不相信別人，懷疑別人是真是假，結果連最簡單的感情也不能流露，也不能接受了。這樣一來，對人自然採取一種防範的態度。墨西哥人自小便學習怎樣堅忍，怎樣堅強，怎樣接受失敗而不失風度。處處要顯示自己並不軟弱，掩飾一切感情來做一個強者。

戴上面具的人，處處要防衛自己，所以便要假裝、便要說謊了。他不敢表達自己。「他害怕別人，所以他退縮，成爲一個影子、一個幽靈、一陣回聲。他不走路，他滑步；他不敘述，他暗示；他不回答，他

呢喃；他不埋怨，他微笑。甚至他唱歌——除非他爆發，撕裂心胸——他也在牙縫間低唱。」

帕斯又指出說：墨西哥人封閉的態度，造成他們對「形式」的熱愛，他們日常生活中都是徹頭徹尾的形式主義者，他們遵循社會上、宗教上和藝術上種種規律，安於正常生活的規範。

表現在文學和藝術上，則是喜愛固定形式（如十四行）的詩、歡迎幾何味道的裝飾和繪畫、接受形式主義藝術而不喜浪漫化的藝術。表現在政治上，則是政治憲法的徒有形式，官僚制度的腐敗。表現在人與人的關係，則是繁瑣客套的禮儀。這種態度表現在每個人身上，使他不能向外界「開放」自己。這也就是所謂說：他戴上一個面具了。這種劃一化的形式跟個人的自我流露往往是衝突的。我們翻開歷史看看，墨西哥的歷史不正是這兩種不同勢力的衝突消長的過程嗎？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者的制憲獨裁，後來是一九一〇年的革命……

這兩種力量的此消彼長，也可在墨西哥人的生活見到。如果前者勝利了，他便戴上面具自我封閉；如果後者勝利了，他便是儘量放縱自我，像在節日的

狂歡。這便是他的兩個極端。

他在日常生活中是戴面具那一面佔上風，所以他的生活態度是謙虛、謹慎、保留，而且他用這些東西來防衛自己。以這些東西為最高的美德。尤其是女子，在他們眼中，理想的女性是內向的，被動的。

帕斯便是這樣說了：別的國家女性可以主動地吸引異性。但在墨西哥，却是男性圍繞她、追求她、向她歌唱，在馬上旋轉，表演來搏她歡心；而她就要躲在謙卑和沉默的面紗後背後，被動地等候別人前來，倒不是說這種被動的態度有什麼不對，而是這套觀念是虛假的。正如帕斯說：墨西哥人對女子很尊重，但女子本身恐怕會寧願少點尊重而多獲得點自由和信賴，寧願別人當她是個人而不是一個象徵。但既然那是一種面具式的生活，又那裏有表達自己的機會呢？

戀愛本來是一種開放。但蒙上面具的人怎可以愛任何東西？一個處處保衛自己，用假裝和謊言來遮去真實感情的人，他的戀愛也可能是一種假裝。

帕斯說：「愛情……是一種不斷的發現，一種現實的洗禮，一種無休止的再創造。但墨西哥人却當愛是一種鬭爭和征服。不是用身體去探人現實而是去

侵犯它。所以被認為是幸運愛人的形象——也許是從西班牙的唐璜變化來的吧——就竟然是一個故意利用感情來佔有女子的人！」

一個戴上面具的人，放棄了表示感情和表示意見的權利，放棄了一部份自我。

墨西哥人的性格也跟東方人的性格有相像的地方。這不禁使我們想到：許多人常說：含蓄、被動、謙卑是我們的優點，但到底是否優點呢？

孤寂的根源

一個墨西哥人不能自然地表達感情，不願表現自己，這是為什麼呢？帕斯說：墨西哥人不願也不敢准他自己，這是因為他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尋覓不到過去的根源，在現代的世界中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在羣衆聚集的節慶中，狂喜或極怒的時候，墨西哥人會喊道：「Viva Mexico, hijos de la Chingada—」(墨西哥萬歲—Chingada的兒子！)而Chingada是什麼呢？它是一個遭受苦難的母親，受蹂躪，受強暴的母親，被動地接受外面的世界而失去自己姓名的

母親。她是虛無本身。說到蹂躪，自然使人想到墨西哥被西班牙征服殖民。關於這歷史的一個象徵是馬蓮茲 Malinche，獻身於西班牙統治者而遭拋棄的印第安婦人，她代表了墨西哥被西班牙所敗壞的印第安文化。難怪到了今天，墨西哥的報章上還用 Malinchista 一詞來形容受外國影響的人了。墨西哥人不願做一個印第安人，也不願做一個西班牙人。他否認這種混血的傳統。他否認自己的過去，而活在孤寂之中。

帕斯在書中「墨西哥的知識份子」一章中，寫出墨西哥的知識份子如何面對這種困惑，從歷史去追尋這種孤寂的源頭，檢視墨西哥從西班牙殖民、獨立、革命而至今日的處境，尋求答案。革命後知識份子的態度普遍是回顧自己國家的本源，何西·維斯岡西羅斯 (Josi Vasconcelos) 可說是當時的代表人物，他是墨西哥現代教育的始創者，他的目的是重新找尋歷史的意義，建立本國的教育。當時知識份子的特色是回向民間，所以古老的歌謠、地方色彩的舞蹈和民間藝術再次受到重視，當代墨西哥藝術誕生了，小說家正視過去和當代的現實，以平民的生活或革命事件

為題材，在獨裁者倒臺後，再重新摸索墨西哥原來的面貌。維斯岡西羅斯希望建立傳統的教育，但卻發現他們的傳統是如此薄弱。若要革新，在一個人民缺乏自由而憲法操縱在少數人手中的國家，又如何可以推行新的自由的教育？在它百廢待興的時刻，墨西哥人發覺，他們的歷史實在是需要自己徹底從頭創造出來的。

但是，當革命結束以後，墨西哥的知識份子參與政府，從事實際的行政工作，却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固然他們做了不少工作，但也失去了他們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獨立性，失去了知識份子對政府批評的功效。這時就出現了另一些抱持批評態度的知識份子：採納激進的政治理論，企圖打破孤寂而與外國認同，另一些知識份子則向本國的根源檢討，如山姆·雷姆士 (Samuel Ramos) 企圖撕開國家的面具，找尋它的真正面目，而何豈居士達 (Jorge Cuesta) 則找尋它的世界性的質素。前者某些立論比較空泛，後者又一開始就採納了法國的影響而忽略法國思想形成自有它的背景，不過兩者致力於對國家自省的工作，是頗有價值的。丹尼奧·哥西奧·維里加斯 (

Daniel Cosío Villegas) 創辦「」出版社，介紹外國的經濟書籍，這出版社結果虧本垮台。在西班牙的戰後，墨西哥對戰敗一方寄以同情，收容不少西班牙知識份子，帶給墨西哥不少影響，其中可以哲學家何西·嘉奧斯 (Jose Gascón) 為代表，成為年青一輩知識份子的教師，教他們如何找尋自己一輩的哲學。最後還要提到另一個知識份子，那是阿方素·雷伊斯 (Alfonso Reyes)，他是一個詩人、散文家及批評家，他在語文的創造上最有成就，他指出作家首要條件是忠於他的文字、文字的運用代表了一種思想方法，使用文字的時候應該使它們清晰準確，使他們成為真正的工具而非概略的面具。當作家與其他入、與他時代的溝通方法失敗後，文字是他參與當代社會的唯一方法，靠着文字，他表達他的本源，找尋出整個國家的精神，對墨西哥作家來說，寫作是使用西班牙文，但把它破壞而重新創造，是爲了使它徹底變成墨西哥文字。

墨西哥的整個歷史，由被外人征服至革命，可視為一種自我的找尋，但却因不同的政體和不健全的表達形式所蒙蔽。墨西哥的知識份子在追尋的過程，就

普遍感到了孤寂和溝通，自我和世界、傳統的欠缺和宇宙性的追求如此極端。他們要追尋一種方法，爲目前當下的存在找尋一個意義。他們反覆自問：墨西哥本國對他們的意義是什麼？他們提出不少問題，給予不少答案。他們發覺「它有時是一張面具，有時是去找尋自我、去剖開胸膛流露出最秘密的聲音的突然決定。墨西哥的哲學不僅要顧及我們傳統和前途的曖昧，要求我們對自我自覺，還需要連帶對我們的問題提出一個普遍性的解決方法。」

墨西哥人經過多次動亂和變化，到了現在又是一番面目了，當他們回顧完畢，再轉過來正視現在，就會發覺他們現在與世界各國正面對同樣的許多難題，沒有過去的成例可以摹倣。「墨西哥人必須像世上每一個人那樣面對現實：孤獨地面對。但在他的赤裸中他會發覺自己真正的世界性，並非像過去那樣只是走在歐洲思想後面摹倣。他的哲學只在語氣、風格和偏重上是墨西哥式，內容却不是。墨西哥就像一個面具，撕開了就露出它所隱藏的真正的人。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建立一種墨西哥哲學，那就是去思考一些不僅屬我們自己也屬於全人類的難題。」

帕斯更進一步指出，今日的問題，不是如梵樂希所言的，西方文化面臨危機，而是全人類面臨危機。不是兩種文化互相衝突，而是逐漸融會為一種文化，代表世界一體的一種文化，而這種文化的內容却出現了危機。所以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在墨西哥的人們所作的抉擇，影響了全人類」，正如每一個地方的人也是這樣。在這樣的情況下，墨西哥人作為全人類一份子，也得自覺自己的責任。

在孤寂中自省

墨西哥在二十世紀經歷的一連串轉變，跟其他拉丁洲、非洲、非洲和亞洲國家的轉變，都有相似的地方。它們經歷了革命或漸進的改革，由自我封閉至與外界接觸，喪失自信至民族主義抬頭，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由封建的傳統邁向現代化的道路。在這期間，墨西哥正如其他國家，遭遇不少困難，而又不知如何面對。在這方面，知識份子的困惑最大；他們一向的觀念只是向歐洲和美國借來的，那些崇高的理論似乎與他們的現實格格不入。資本主義和社會

主義的理論都跟他們的實際情況有了距離。所以最後他們必須自覺去正視現實情況，要創造新的字彙、運用新的觀念，來討論面對的新現實。（中國人的情況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墨西哥，正如那些其他的國家，它的問題是：如何廢除一切空洞的規條，建造一個更合理的社會。墨西哥已經歷過殖民、專制、革命等等歐洲國家所提供的僵化的形式，跟着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打破這些舊形式，建立一個不再是謊言、壓迫、暴力統治的社會；即是說：一個更人性的社會。在建立的過程中，它揚棄舊的形式，也得揚棄舊的觀念。它不能再應用借自歐美的觀念，但在信仰、理念、上帝和烏托邦都失敗以後，它該找尋怎樣的觀念以作慰藉？它得撕開面具，面對自己，在這樣的情形下它才可以真正的生活和思想。這時它也是在一種真正的孤寂中。

帕斯在書的末章討論孤寂的本質。他指出：孤寂並非墨西哥人獨有，全人類，在他們一生的某個時刻，都會感到孤寂。孤寂到底是怎樣一種境況，而人們又如何去超越它呢？他說：當一個嬰孩出生後，他面對一個陌生的世界，起先的反應只有哭泣和沉默。把

它與另一個生命連繫起來的臍帶已經斷了，他就處在孤寂之中；而逐漸的，他靠着遊戲和愛，重新建立與外界的連繫。但外界要求反應，他與外界的關係，就不再像在母胎中那樣是被動的。他逐漸發覺言語的妙用，說話變成一個人與外界現實接觸的一種創造性的行為，一種詩意的行動。孩子靠言語建立了自己的世界。青年時期孤寂更是顯著的特色，因為人在這階段開始自覺自己與他人不同。又由於青年極度自覺，只有靠自我的遺忘及屈服才可消除自覺。所以青年時期也是戀愛、英雄主義和為理想犧牲的階段：青年在孤寂中向世界開放：去愛、行動、建立友誼、參加運動、從事英雄式的冒險。到了中年的成熟期，孤寂似乎不是最顯著的特色，因為他可藉工作或固定的生活把它遺忘。但在這集體工作集體娛樂的社會中，他却始終無法完全投入，人與人之間有更大的隔膜。在辦公室、在酒店，在商店、和娛樂場所，他感到更大的孤寂。

帕斯在分析孤寂的本質時說，孤寂本身有兩重意義：一方面是與一個世界隔離，另一方面是企圖創造另一個世界。我們經常談到孤寂，彷彿它是一種疾病

，其實它也有正面的意義。它代表一種暫時的退隱，以便重新投入世界，採取行動。它是一段準備和學習、自我考驗和磨煉的時光。歷史上的許多偉人，如柏拉圖、聖保羅、佛祖、但丁等人，都經歷過這樣的階段。

廣義來說，孤寂是對回歸母體的渴望，對歸屬樂土的渴望。根據墨西哥古老的傳說，人們原居於世界的中心，宇宙的「肚臍」那兒，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被迫離開了。這正如其他文化所謂的樂園與樂土，人們普遍有一種失樂園的感覺，這便產生了孤寂。在孤寂中，每個人，正如每個民族，自省自己的性質、尋覓自己的身份，追求自己的歸屬，而且時刻藉着詩（言語）和愛來超越這種孤寂。

帕斯所寫的不僅是墨西哥的生活和思想，也是全人類的經驗。如果說他寫一個自覺反省的民族，必然會置身在一個「孤寂的迷宮」中，那麼他同樣相信：在這孤寂的迷宮的出口，我們將可以與全世界團聚，找到更豐富與和諧的生活。

轉載自一九七六年五月
二十八日「大拇指周報」